

# 印度棉布與中國—— 以十六、七世紀為中心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提 要

在明代，中國社會所擁有的印度織品得自海島與大陸東南亞的貢品，以及琉球、中國商人的貿易商品。明末則亦輾轉獲自歐洲人與中國貿易家之手。因為供需過程係屬間接，所以來源及品名都很難辨識。加上目前所知流傳實物絕少，因此研究者不多，是個很困難的課題。

不過，文字的史料倒相對比較容易找到。我們或許可以先從文字上整理此一段史實，設法辨識若干品類，並且建議一些進一步探討的方法。藉此機會，也可以帶進當時人對南亞與東南亞的認知，並且獲得若干歐亞互動的印象。

本文利用各種史料，爬梳出印度棉布在中國進口與流通的概況，同時對比定中外文獻對同種印度棉布的稱法，作出建議。此種比定若能廣泛達成，當可方便利用中國境外的收藏與資訊，具體化對十六、七世紀出現在中國之印度棉布的理解。

**關鍵詞：**西洋布、哆囉呢、注輦、大巴丹、琉球

問：「了事底人如何？」師云：「正大修行。」學云：「未審和尚還修行也無？」師云：「著衣吃飯。」學云：「著衣吃飯尋常事，未審修行也無？」師云：「你且道我每日作什麼！」——《趙州禪師語錄》

## 一、前言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生產棉布的國度之一。<sup>1</sup> 印度北境隔著喜馬拉雅山，漸次可及西藏、四川，輾轉到達中原；此外，還有海路可通，<sup>2</sup> 早在秦、漢之時已經交通往來。棉布也成為最早輸入中國的印度產品之一。不過，要等到黃道婆引進彈棉花去籽的工藝技術，以及元代及明初統治者的推廣，棉紡織業才普及。<sup>3</sup>

印度很早就開發了棉布的紡織與染色的工藝，而中國的棉紡織業則要到宋末元初（13-14 世紀）才真正起步，兩者之間有著一兩千年的落差。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有絲、有葛、有麻，衣著材料原本多元而豐富，因此要到近七八百年前開始，棉布才成為中國人的主要衣著材料。

不過，中國人極早即獲知棉花與棉布。散見於史書的「古貝」、「吉貝」、「朝霞」……等與之有關。早年中國所見的棉貨往往出自南亞、東南亞國家致贈的禮物。若就考古資料而言，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在敦煌所獲得的織品殘片中，有棉布屬於漢代之物。<sup>4</sup> 而 1959 年在新疆民豐縣發掘出土的棉布則為最大塊的殘留。<sup>5</sup> 從東漢到南宋，一千多年間，印度棉布偶爾還是以貢品的名目寫入中國的歷史。不過，至晚在南宋時，中國也已經有規模地自印度進口棉布——當中有東南亞、南亞商人帶來者，亦有中國商人前往印度採購運回販售者。由元到明，印度棉布繼續以貢品與商品兩種不同的方式進入中國。從明末以迄清中葉，也

1 吉岡幸雄，《京都書院美術雙書·20·更紗》（京都：京都書院，1993），頁 92-95。參考 Jenny Balfour-Paul, *Indigo*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8)。

2 伯希和（Paul Pelliot）撰，《交廣印度兩道考》，馮承鈞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

3 參考陳澄泉、宋浩傑主編，《被更烏溼名天下：黃道婆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 Balfour-Paul, *Indigo*, 18.

5 夏鼐，〈我國近五年來的考古新收穫〉，《考古》，1964 年第 10 期，頁 485-493、507；王華、張伍聯，〈尼雅遺址出土的東漢蠟染布研究〉，《東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卷第 1 期（2006.3），頁 24-27。可參考趙豐，〈尼雅出土蠟染棉布研究〉，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九、十輯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790-802；趙豐，《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2），頁 89-97 也處理同一主題。

就是 16-18 世紀之間，印度棉布在中國經常被提起。

不過，棉布不似香料珠寶，不屬貴重物品，留意者少。印度棉布的花樣又帶有濃厚的文化氣息，往往無法為中國的文人學者所理解、所欣賞，以故能詳細記錄者亦稀。加上進入到中國的棉布，經常被賦予只在中國流通使用的名稱，而傳世的織品又極少為人知，欠缺實物以供研究及比定。<sup>6</sup> 整體而言，研究在中國流通過的印度棉布困難重重。然而印度棉布確曾在中國流通使用，從而文獻常有提及。本文簡單重建棉布在中國歷史上流通的概況，並且嘗試提出一些比定中外印度織品名稱的辦法。

## 二、東亞歷史上的印度棉布

有關印度棉布的資訊很早就傳到中國。中國古代東南沿海居民稱棉為吉貝或古貝。《農書》卷二一引三國時代（西元 220-280）萬震《南州異物志》云：「班布，吉貝木所生，熟時狀如鵝毳，細過絲綿，中有核如珠玑，用之則治出其核。昔用輓軸，今用攪車，尤便。」<sup>7</sup> 古代又稱棉和棉布為白疊。南北朝的正史經常提到「白疊」。例如《南史·夷貊傳》：「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纒，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為布，甚軟白，交市用焉。」《舊唐書》提到林邑、南詔、陀洹、環王、投和、訶陵、名蔑等國皆以白氎、朝霞為衣。「白氎」自然是「白疊」的異寫，而「朝霞」，一說即是袈裟。法雲《翻譯名義集》云：「此云大細布，緝木綿華心織成。」<sup>8</sup> 也是一種棉織品。

實物方面，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在敦煌發現的 9 塊織品殘片。其中 8 塊為漢代（206 B.C.-A.D. 220）之物。紋飾係用藍靛染色，其圖案作龍、鳳、圓盤之類。<sup>9</sup> 目前中國境內已知最早的棉織物於 1959 年出土於新疆民豐

6 江西益宣王朱翊釗的墳墓中所出土的一塊寫有墨書「西洋布」的棉布，可能是目前所知唯一的明代進口棉布實體。參考許智范，〈地宮幽壙·秘藏奇珍——明朝益藩王府寶器欣賞（下）〉，《收藏界》，第 11 期（2003），頁 4。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釗夫婦合葬墓〉，《文物》，第 8 期（1982），頁 24 提的是有「西洋布」字樣的白細布。《文物》該文頁 17 報導朱翊釗棺內有棉布一匹，為平紋細布、米黃色，幅寬 0.75、長 13 米。這兩個描述是否指同一匹棉布，難以辨明。不過，趙豐卻把當們直接當成是同一物件。見趙豐，《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頁 309。

7 （元）王禎，《農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8 （宋）趙汝适，《諸蕃志校注》，馮承鈞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122-124。參考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臺北：聯經，1977），頁 19-20。

9 Balfour-Paul, *Indigo*.

縣。<sup>10</sup> 7-15 世紀（從唐朝到明中葉）時，東南亞國家以棉布作貢品。<sup>11</sup>

宋元時期中國也自行進口印度棉布。<sup>12</sup> John Guy 發現南宋政府將香藥寶石作為「禁權品」(closely monopolized goods)，由國家專賣；其餘進口商品視為「放通行貨物」(freely transacted goods)，由民間自由買賣。「將印度織品歸類到『放通行貨物』，可說是最早點出它們是擬銷往一個廣大的市場。印度棉貨不再是那麼稀罕的東西，它們的供應越來越多，使得社會上的應用更為廣泛。」<sup>13</sup>《宋會要輯稿》收錄的紹興三年（1133-1134）十二月十七日戶部建議，「諭令起發赴行在送納」「蕃商販到」物品當中，有蕃顯布、海南碁盤布、海南吉貝布、海南青花碁盤皮單、海南白布、海南白布皮單、青碁盤布紬……等布疋。<sup>14</sup> 紹興十一年（1141），戶部修訂上項規定，列舉出吉貝布、襪面部、小布、大布、蕃青班布、白熟布、白細布、芎袴布、麤小布、白苧布、鞋面布、生苧布、青花蕃布、吉貝花布、吉貝紗、麤黑小布、海南白布單、青蕃碁盤小布、毛施布、蕃頭布、海南碁盤布、海南青花布皮單……等纖維或織品。<sup>15</sup> 當中冠以「海南」字樣者當為瓊州海南島所產。白苧布應為苧麻纖維織品。吉貝布自然是棉織品。此外其他品名雖然不得其詳，但為棉織品的可能性很高。瓊州的黎族很早就生產棉織品，中原地區在南宋初年則尚未發展該項產業。宋代以「蕃」字代表外國，看來相當數量及種類的棉布係從海外進口，其中自然不乏印度棉布。

1349 年以前著作完成的元代（1271-1368）汪大淵的《島夷誌略》〈土塔〉條云：

10 參考中國古代科技文物展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代科技文物展》（北京：朝華出版社，1997），頁 97。

11 Mattiebelle Gittinger, *Splendid Symbols: Textiles and Tradition in Indonesia* (Singapor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4.

12 兩宋與南印度的注輦（Chola）有朝貢關係。注輦所在地即今 Tamil Nadu 省，17-18 世紀時歐洲人稱為科羅曼德爾海岸（Coromandel Coast），當地盛產棉布，與中國交往或許也有行銷本國織品的意味。參考陳國棟，〈談熙寧十年注輦與三佛齊入貢中國事——關於地華伽囉（Deva Kulottunga）〉，收在《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 45-63。

13 John Guy, *Woven Cargoes: Indian Textiles in the Eas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8), 153-157, esp. 154.

14（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職官四四·市舶〉，頁 3372。

15（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市舶〉，頁 3374-3375。

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圍繞，有土磚甃塔，高數丈。漢字書云：「咸淳三年八月畢工」。傳聞中國之人其年旼〔販〕彼，為書於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焉。<sup>16</sup>

咸淳為南宋度宗的年號，咸淳三年當西元 1267 年。中國人於 1178 年（周去非之《嶺外代答》著作完成之時）之前已常川前往西岸的故臨。若說不久之後也到東岸活動，可能性當然極大。不過，到故臨一方面是為了換船，以便接續航程前往波斯灣；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故臨接近印度西岸（馬拉巴兒海岸，今喀刺拉省）胡椒的集散地古里（Calicut, Kozhikode），便於華人採買胡椒；至於前往巴丹平原，其實就是為了採買織品（印度棉布）。

土塔所在之地——大巴丹（Nagapattinam）——位於印度半島東南海岸。這塊海岸被歐洲人稱作科羅曼德爾海岸（Coromandel Coast，源自坦米爾文地名 Cholamandalam，今稱 Tamil Nadu），為宋代（960-1271）曾經向中國朝貢的注輦（Chola）國所在地。明代建國之初，派人前往該地區找人前往中國朝貢，在《明實錄》洪武五年（1372）正月壬子條下留下了紀錄：

瑣里國王卜納的，遣其臣撒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刺丹、八兒山奉金葉表，貢馬一匹、紅撒哈刺一連、紅八者藍布四疋、紅番布二疋、覲木里布四疋、白苾布四疋、珠子項串一副，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先是，三年（1370）六月遣塔海帖木兒持詔諭其國，至是始與俱來。上謂中書省臣曰：西洋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於是賜卜納的大統曆及織金文綺紗羅各四疋；幹的亦刺丹、八兒山等文綺紗羅各二疋；僉從高麗布各二疋。<sup>17</sup>

此時注輦（即 Chola，瑣里為其另一譯名）早已亡國。其地（即前述之科羅曼德爾海岸）由入侵的 Vijayanagar 王國國王 Bukka Raya I（1356-1377 在位）統治。瑣里的貢品由撒哈刺、八者藍布、番布、覲木里布、苾布等織品以及馬匹、珍珠項鍊構

16（元）汪大淵著、蘇繼廌校釋，《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285。

17（明）李景隆等撰，《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71，頁 1313-1314。

成，主要以織品為主。當中除「撒哈刺」為毛織品<sup>18</sup>外，皆係棉布，而坦米爾之地（Tamil Nadu）正是棉布產地。

明代開始不久即實行海禁。1405-1433年間，有所謂鄭和下西洋之舉。下西洋結束之後，海禁趨嚴。在1433-1567年之間，琉球人成為東亞地區主要的海上長程貿易家，他們進口南亞、東南亞織品，行銷到東亞其他國家。<sup>19</sup>東南亞國家的領袖致贈琉球王國長上的禮物當中，也不時出現印度織品。例如，琉球《歷代寶案》所收錄的文件中，如下兩件便涉及源自南亞的織品：

三佛齊國寶林邦（Palembang）粧次本頭娘稽首再拜，即日孟春謹時。伏惟琉球國公卿王相台座譴責，不謂謙仁貶物，各教佩服厚意，退揆缺然。自宣德五年（1430）十二月十一日受到寄來批信，大膽收受齊全。感謝鈞候興居多福。仰依大夏旃幪之庇闢，尚稽瞻仰鈞庭。此承藻翰誨諄，復少禮鶴。俟治報迨今慊然。昨承教帖，諒蒙恕照。今特貴國本船回還，賫寄禮物前詣回謝，幸希收納。今來人船買賣完備，趕趨風汛前往處所。草字不專，伏乞頓納。

苾布二匹

長文節智壹塊

頂子壹匹

沉香壹拾斤

宣德六年（1431）二月初三日本頭娘再拜奉書<sup>20</sup>

第二件：

三佛齊國寶林邦（Palembang）愚婦俾那智（Pinatih）施氏大娘仔百拜，

18 Henry Yule and A. C. Burnell,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861-862. 參考勞費爾著、杜正勝譯，《中國與伊朗：古代伊朗與中國之文化交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75），頁367-369；勞費爾著、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篇：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的貢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326-328。

19 以琉球與東南亞的貿易關係為主題的作品相當豐富。可參考小葉田淳，《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日本評論社，1939）；Shunzō Sakamaki, "Ryukyu and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3 (1964.5) Shunzō, 383-389；Takeshi Hamashita（濱下武志），"Ryukyu Merchants and Their Pepper Trade under Tributary System: 15th-17th Centuries," 收在陳國棟主編，《漢文化與周邊民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115-172。

20 《歷代寶案》，卷43，見沖繩縣立圖書館編，《歷代寶案》（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1992），第2冊，頁639-640。

上書琉球國王相（懷機）尊候台前。拜達台誨，倏易歲華。權掌當朝之大事，即日仲春謹時，敬惟公庭清逸，鈞候納福無量。

自宣德五年（1430）船隻前來到邦，明稱貴國王庭仁義禮祝，未由叅拜均墀，少意奉讀。草邦賤國，希少貴物。今見便船回國，博禮奉貢，准表鵝毛之意。草字，不專。伏乞笑納。

今開奉來博禮：

紅花布被面一合

紅花布頂子一合

青花文佃布二合

象牙二條

淡杯仙酒四埕

宣德六年（1431）二月初三日愚婦俾那智施氏大娘仔百拜奉書<sup>21</sup>

三佛齊（Sri Vijaya）在 14 世紀中期已經徹底瓦解，但還在中文文獻中留下這個國名，通常被用於指稱其舊都所在地的巴鄰龐（Palembang，文件中稱作寶林邦；華人亦稱之為舊港、巨港）這個港市政權（port polity）。以上這件為蘇門答臘巴鄰龐贈與琉球國的禮品清單；以下一件則為馬六甲（滿刺加、Malacca、Melaka）送與該國的禮物。當時國際貿易的進行，互贈禮物為整個流程的一個必要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東南亞國家致贈琉球的禮物中，源自印度的棉織品常常佔了很大的份量：

成化三年（1467）三月：好三連打貳拾匹、椒達布拾匹、□達布九匹、南嘆哪布十一匹，共計伍拾匹。

成化五年（1469）正月：別布好嘍十一个、別底嘍十九个、南母掌十个、山南八好嘍五个、左達五个。

成化六年（1470）三月：喏哪哩壹匹、細紹達布四匹、苾布伍匹、紹達布四十四匹。

成化十六年（1480）二月：山南不十足、生已殺十足、南母□十足、山南不文地里十足、火外十足。

成化十七年（1481）三月：吉地布貳拾个、林母拿拾貳个、星幾指拾肆

21 《歷代寶案》，第 2 冊，頁 640-641。關於施大娘子，參考 Tan Yeok Seong, “Chinese Element in the Islam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 Study of the Story of Njai Gede Pinatih, the Great Lady of Gresik,” in *Collected Writings from the Ya-Yin Studio* (Singapore: The South Seas Society, 1983), 109-117.

个、山南比肆个。<sup>22</sup>

麻六甲位居東亞（含東北亞與東南亞）貿易圈與南亞貿易圈的交會地，當地印度布疋種類繁多。<sup>23</sup> 1512-1515 年間在麻六甲撰述《東方志》（*The Suma Oriental*）一書的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寫到：

坎巴夷（Cambay, Khambhat）主要伸出兩隻手臂，以她的右手踏觸亞丁，另一隻手麻六甲。以之為最關緊要的航進所在。……

麻六甲沒有坎巴夷是活不下去的，而坎巴夷也不能沒有麻六甲……假如坎巴夷一旦被從它與麻六甲的貿易中切離，它也就毀了，因為它的商品將沒有出路。<sup>24</sup>

坎巴夷為印度西北部固加拉特（Gujarat）的主要港口之一，而固加拉特又赴是印度棉布主要產地之一，麻六甲則為其向東南亞銷售的窗口，棉布充斥。黃衷（1474-1553），《海語》〈風俗·滿刺加〉條云：

其民皆土室而居。其尊官稱姑郎伽邪，巨室稱南和達。民多饒裕。南和達一家，胡椒有至數千斛；象牙、犀角、西洋布、珠貝、香品若他，所蓄無算。<sup>25</sup>

16 世紀初年以前，琉球人經由東南亞交易不少印度棉布，從而在《歷代寶案》中留下紀錄。該項資料，以漢字寫成，保留了一部分印度棉布在南亞或東南亞的名稱（有時為譯音），有助於還原其原始的名稱與掌握實際的內容。

附帶一言：琉球因為進出口印度棉布，因此其生活語彙中早就有「尼失木綿」

22 小葉田淳，《南海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日本評論社，1939），頁 534；《歷代寶案》，第 2 冊，頁 507-519。

23 關於 16-17 世紀亞洲貿易圈的問題，請參考 K. 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4 Armando Cortesao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 account of the East, from the Red Sea to Japan, written in Malacca and India in 1512-1515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Rutter of a Voyage in the Red Sea, Nautical Rules, Almanack and Maps, written and drawn in the East before 1515* (New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90), Book I, 42, 45. 中文譯本見多默·皮列士著，《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何高濟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26-27。

25（明）黃衷（1474-1553），《海語》（道光廿五年冬十一月南海伍氏開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年翻印本），卷 1，〈風俗·滿刺加〉條（1/3b-4b）。案、「姑郎伽邪」即 *orang kaya*，本義為有錢人；「南和達」即 *nakhuda*，本義為船主。



(にしもめん)一詞，1534年出使琉球的明朝官員陳侃在其所著的《使琉球錄》收錄了當地的「夷語」，便解釋說是「西洋布」。<sup>26</sup>

### 三、元明清史料中的西洋布

元(1279-1368)、明(1368-1644)時期流入中國的印度棉布，大約就是泛稱作「西洋布」一類的織品。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開封的猶太人立了一座碑，題記為〈重建清真寺記〉(圖1、2)。記中略述猶太人在中國河南開封長久定居的緣由。中間提到：

噫！教道相傳，授受有自來矣。出給天竺，奉命而來，有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聶、金、張、左、白七十姓等，進貢西洋布於宋帝，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宋孝宗隆興元年癸未(1163)，列微五思達(Lévi Oustâ)領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sup>27</sup>

七十個猶太家族於宋代時遷入汴京居住，進貢「西洋布」。雖然說敘述宋代史事，但敘事的時機為明孝宗時，「西洋布」一詞未必能代表宋代的用法，因此應該保守地當成是明代的語彙。<sup>28</sup>就此而言，我們不好說宋代一定已經使用「西洋布」一詞。話說回來，開封猶太人追述其族人前到中國，道經印度(天竺)，以「西洋布」為禮物進貢給大宋皇帝，則「西洋布」即是印度棉布，不待辯而自明。

不過，在元朝時，「西洋布」一詞確實已經相當普遍，而其實物本身也有一定程度的流通。例如，趙孟頫(1254-1322)的一件尺牘(圖3)，就提及朋友餽贈的

26 (明)諸家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87種·使琉球錄三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頁40。在日語當中，以漢字書寫，「尼失木綿」即作「西木棉」，也就是西洋棉布的意思。

27 原碑拓本影像見 Le P. Jérôme Tobar, *Inscriptions Juives de K'ai-Fong-Fou*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12), 36-37 之間；釋文及註解見頁 36-54，引文見頁 43-44。原碑引文亦見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65-68。電子檔見 <https://collections.dartmouth.edu/teitexts/tenney/diplomatic/ms794-009cn-diplomatic.html> (檢索日期：2016年9月20日)。

28 事實上碑文提到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初次建寺，時間上已經是南宋，汴梁也不在南宋治下，而係金朝的領土，使用的紀年應為金世宗大定三年。此處以宋孝宗紀元，反映的正是明朝人的華夏中心觀點。不過，猶太人移入汴梁的時間係在北宋，仍為事實。參考 Donald Daniel Leslie,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Kaifeng* (Leiden: Brill, 1972) and Michael Pollak, *The Jews of Dynastic Chin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Cincinnati: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Sino-Judaic Institute, Menlo Park, Calif., 1993)。

西洋布：

孟頴頓首，晉之足下：數日來，心腹之疾大作，作惡殊甚。令親至，得所惠書，知安善，為慰不可言。付至西洋布及報惠諸物，一一拜領，感激無喻。員印冀用情，昨仲美以為必可得，望以下意祝仲美委曲成就為佳。沈提領處綾，亦望催促。令親帶來帟素，緣情結不佳，不能盡如來戒，千萬勿訝。人還，草草具答，餘唯珍愛。不宣。

十一日，孟頴再拜。<sup>29</sup>

從文字上看，趙孟頴言下提及「西洋布」頗為稀鬆平常，顯然已是日常生活習見之物。由此亦可推斷當時西洋布在中國社會或許頗為流通。<sup>30</sup>

在元末周遊亞洲海域，於 1349 年前將其見聞撰成《島夷志略》一書發表的汪大淵（1311-1349）也揭露了他在東南亞與南亞經常看到某地生產西洋布（或使用其他名稱的布疋），或者某地是西洋布的進口與消費市場。例如，他說：

〈麻逸〉：「地產木綿、黃蠟、玳瑁、檳榔、花布。貿易之貨用鼎、鐵塊、五采紅布、紅絹、牙錠之屬。」

〈無枝拔〉：「產花斗錫、鉛、綠毛狗。貿易之貨，用西洋布、青白處州磁器、瓦壘、鐵鼎之屬。」<sup>31</sup>

〈日麗〉：「土產龜筒、鶴頂、降真、錫。貿易之貨，用青磁器、花布、粗碗、鐵塊、小印花布、五色布之屬。」

〈淡邈〉：「地產胡椒，亞於八都馬。貨用黃硝珠、麒麟粒、西洋絲布、粗碗、青器、銅鼎之屬。」

2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趙孟頴致晉之尺牘〉，《元趙孟頴七札》冊。影像見圖 3，文字見趙孟頴，〈與晉之〉，《松雪齋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下。參考英和等編，《欽定石渠寶笈三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第 4 冊，頁 282；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輯，《故宮書畫錄（上）》（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6），卷 3，頁 38-40。

30 可參考杉本直治郎，〈元代南海における貿易品としての西洋布——その用いられたる地方とその産地——〉，《東南アジア史研究》（東京：巖南堂書店，1968），頁 609-636。

31 無枝拔，《新唐書》作「半支跋」或「千支」。（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點校本），卷 222 下，〈南蠻下·瞻博〉條，頁 6304：「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屬國，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菴。」參考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2），頁 154。半枝跋可能是梵文 Panchapalli 的對音，地望不詳。南印度 Tamil Nadu 有一個水庫叫作 Panchapalli。可參考（元）汪大淵著、蘇繼庠校釋，《島夷誌略校釋》，頁 38 〈無枝拔〉條；頁 39 且有長註討論「無枝拔」一名。

〈大八丹〉：「地產綿布、婆羅蜜。貿易之貨，用南絲、鐵條、紫粉、木梳、白糖之屬。

〈土塔〉：「地產綿布、花布大手中、檳榔。貿易之貨，用糖霜、五色絹、青緞、蘇木之屬。」<sup>32</sup>

土塔即在大巴丹，而大巴丹即 Nagapattinam，位在印度半島東南岸的科羅曼德爾海岸，正是盛產印度棉布的地方。

明代文獻所見的「西洋布」這樣的泛稱究竟何指，需要進一步討論。清修《明史》只在淳泥、滿刺加與錫蘭三國傳中提到西洋布。但是《明實錄》所見到的「西洋布」則至少出現在 18 個地方；其他提及「西洋紅布」或其他類似用法的情況更多——最早為洪武五年（1372）。<sup>33</sup> 明代官方接觸的西洋布的來源，除鄭和下西洋期間（1405-1433）帶回者外，多為經琉球與雲貴邊界進口至中國者。皇帝用以賞賜親藩及朝中大臣。<sup>34</sup> 前舉明益王夫婦墓出土文物當中有墨書「西洋布」字樣的白細布實物一件。<sup>35</sup> 事實上，凡是冊立東宮、親王……等場合，經常賜予當事者西洋布！例如：

嘉靖十八年（1533）賜親王，一等：銀三百兩、紵絲十疋、紗十疋、羅十疋、錦四段、生熟絹三十疋、高麗布十疋、白氈絲布十疋、西洋布十疋；二等：銀二百兩、紵絲八疋、紗八疋、羅八疋、錦四段、生熟絹十六疋、高麗布六疋、白氈絲布六疋、西洋布六疋；三等：銀一百兩、紵絲六疋、羅六疋、錦四段、生熟絹十二疋、高麗布六疋、白氈絲布六疋、西洋布六疋。<sup>36</sup>

因此在親王墓中看到陪葬的西洋布應屬正常。在發掘朱翊鉞夫婦墓之前約 15 年左右，也在江西南城縣發掘過另一座益王家族成員的墳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張墨書清單，羅列的物件名稱包括「白西洋布衫一件」、「白西洋布單中衣一件」、「白洋布

32（元）汪大淵著、蘇繼庠校釋，《島夷誌略校釋》，頁 33-34、38、86、133、280 及 285。

33（明）李景隆等撰，《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 71，頁 1313-1314。

3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各冊。

35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鉞夫婦合葬墓〉，《文物》，第 8 期（1982），頁 24。

36（明）李東陽等撰，申明行等重修，《大明會典》（臺北：新文豐，1976），第 3 冊，卷 110，〈給賜·冊立〉，頁 1640。

單裙一條」、「白洋布暑袜一雙」。押署的日期為萬曆二十一年（1593）六月。<sup>37</sup>顯然這些衣物是用御賜的西洋布或白洋布裁製成的。

然而，西洋布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布疋，具有怎樣的特色呢？曾經於 1413、1421、1431 等年（第四、六、七次下西洋）三度伴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親身造訪過亞洲海域的多個國家，在其所著的《瀛涯勝覽》〈古里〉條有這樣的敘述：

西洋布，本國名曰撿梨布，出於鄰境坎巴夷等處。每疋闊四尺五寸，長二丈五尺，賣彼處金錢八箇或十箇。國人亦將蠶絲練染各色，織間道花中，闊四尺五寸，長一丈二、三尺餘，每條賣金錢一百箇。<sup>38</sup>

「撿梨」讀音近於 sari，可是 sari 是印度婦女的衣服，並不指布疋。<sup>39</sup> 個人意見以為可能是 sarasa 的譯音。不過，sarasa 指一種類型的印度花布，而非所有的印度棉布。在馬歡的認知下，西洋布是古里（Calicut, Kozhikode）北方坎巴夷（Cambay, Khambhat）所生產的印度花布。坎巴夷屬固加拉特（Gujarat）地區，古來即是著名的印度棉布產地。<sup>40</sup> 依據馬歡的描述，西洋布並非古里本地所產；古里只是一個港市與行銷中心。事實上，馬歡所認知的西洋布也只能代表某一些特定形式的印度棉布，而不是大部分的印度棉布，甚或所有各種棉布。

明末竟陵派詩人譚元春（1586-1637），有一首四言詩，詩題為〈雷太史家有送子觀世音菩薩畫像一軸，其地如西洋布而堅密，設色靈幻，菩薩手一兒舉念珠似鸚鵡，肉情巾袂俱動，拜而頌之〉。<sup>41</sup> 在譚元春的理解中，西洋布的特色是「堅密」——織得緊密而且韌性堅強。

37 薛堯，〈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 年第 6 期，頁 318-320。

38（明）馬歡著，《瀛涯勝覽校注》，馮承鈞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古里〉條，頁 47。杉本直治郎據《瀛涯勝覽》，說西洋大國古里國南鄰之撿黎（Shaliyat）及其東之坎巴夷（Koyampadi=Coimbatore）皆為西洋布產地，而集中於古里港，輸往南洋各地，見其〈元代南海における貿易品としての西洋布——その用いられたる地方とその産地——〉，收入氏著，《東南アジア史研究》（東京：巖南堂書店，1956、1968），頁 635。杉本以「撿黎」為地名，不過地望似乎不太準確。

39 參考 Robyn J. Maxwell, *Sari to Sarong: Five Hundred Years of Indian and Indonesian Textile Exchange* (Canberra: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2003).

40 參考 Ashin Das Gupta, *Indian Merchants and the Decline of Surat, c. 1700-1750* (Wiesbaden, Germany: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9); Eiluned Edwards, *Textiles and Dress of Gujarat*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2011).

41（明）譚元春，《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 1，《岳歸堂合集》。該詩亦收入朱隗輯，《明詩平論》，明崇禎十七（甲申）年（1644）刊本，卷 8，頁 9ab。

明末另一位知名人士徐光啟（1562-1633），是中國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與歐洲來華的傳教士往來甚勤。在其所著的《農政全書》中言：

《松江志》又言：「綾、布二物，衣被天下。」原此中之布，實不如西洋之麗密。曾見浙中一種細布，亦此中所未見者。徒以家紡戶織，遠近通流，遂以為壤莫、為利源也。第事勢推移，無數百年不變者。……<sup>42</sup>

徐光啟的這段評述，說明他見識到「西洋布」的優點，也證明「西洋布」的確在中國有一定的流通。可是，由於徐光啟與歐洲人有所往來，不免容易使人誤以「西洋」即指歐洲。確實，隨著葡萄牙人長駐澳門以及天主教傳教士東來，歐洲織品也開始出現在中國。不過，歐洲布疋來到中國者不多，並且以絨布（大呢 broadcloths 和嗶嘰 long ells）及羽紗（camlets）為主。<sup>43</sup> 徐光啟在此所討論的為「布」，與作為絲織品的「綾」對舉，當然就是棉織品。松江棉布原是中國人公認的最佳國產棉布，可是徐光啟明白指出「西洋（布）」比松江布來得更加「麗密」——漂亮而緊密。當時歐洲尚未產製棉布，徐光啟所拿來與松江布相互比較的織品當然是印度棉布。

事實上，《農政全書》又提到一般進口的西洋布雖然細密，卻無光澤；不過，他曾見過孟加拉（Bengal）棉布，方始明白其究竟的道理：

又，中土所織棉布，及西洋布，精麤不等，絕無光澤。而余見曹溪釋惠能所傳衣，曰屈眴布<sup>44</sup>，即白氎布，云是西域木棉心所織者，其色澤如蠶絲，豈即娑羅籠段耶？<sup>45</sup> 抑西土吉貝，尚有他種耶？又嘗疑洋布之細，非此中吉貝可作。及見榜葛刺吉貝，其核絕細，綿亦絕軟，與中國種大不類。乃知向來所傳，亦非其佳者。<sup>46</sup>

另一方面，到了 17 世紀中葉前後，歐洲織品的確來到中國，往往也以「西洋布」

42（明）徐光啟撰，《農政全書校注》，石聲漢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969。

43 參考龍思泰著，《早期澳門史》，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註（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頁 312。

44（宋）法雲，《翻譯名義集》（臺北：新文豐，1987，影印《明嘉興大藏經》本），頁 803，卷 18〈沙門服相篇第六十〉說：「屈眴，此云大細布，緝木綿華心織成。其色青黑，即達磨所傳袈裟。」參考（明）徐光啟撰，《農政全書校注》，頁 984-985。

45 依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頁 10，「娑羅木」確實來自古梵文 Salmali，指野生木本亞洲棉。

46（明）徐光啟撰，《農政全書校注》，頁 960-961。

來指稱，當代人與後代的研究者常常感到困惑。一個較早的個案見於明末福建莆田人姚旅（？-1623？）的《露書》。他在討論廣東對外交通時提到：

羅華宗者，西洋人，慕華而至華，衣冠飲食言動皆宗華者。余問：「西洋布出若國乎？」答云：「彼小西洋，吾所居大西洋，在京師之背北海中，去京師不遠，阻於鞬靽不能飛越，故必至南海焉。自西洋至南海須閱三歲，海中自有小島，小島自為一國，時可泊舟焉。」<sup>47</sup>

推其意所指，「小西洋」為南亞印度；「大西洋」為歐洲。羅華宗當時的「西洋布」指印度一帶所生產的織品。在1623年之前，連到中國的歐洲人都認為西洋布的產地是「小西洋」，而非歐洲。

然而16世紀後期，歐洲織品也已開始出現在中國人眼前。例如王三聘（1501-1577），《古今事物考》卷三〈西洋布〉條云：「布，其白如雪，闊七尺。」文字太簡單，只告訴讀者他所知的西洋布色澤極白，布幅甚寬。無法斷定他所謂的「西洋布」究竟為亞洲還是歐洲的產物。同書同卷卷末介紹了多種織品，在〈西洋布〉之前的一條為〈西洋剪絨單〉，說明「出西番，絨布織者。」無法斷定是否為歐洲所生產的天鵝絨。<sup>48</sup>「剪絨」為一種起絨織物，相當於英文的velvet（葡萄牙文veludo；西班牙文velludo）或中文的天鵝絨。1571年西班牙人入據馬尼拉之後，即將歐洲產製的天鵝絨販售予前往馬尼拉貿易的中國商人。不過，至遲到1595年時，西班牙人已經發現，中國人已經開始生產天鵝絨，天鵝絨在對中國貿易上已經沒有太大的價值。<sup>49</sup>

47（明）姚旅，《露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670。

48（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頁40。關於剪絨單的討論，可參考趙翰生，〈明代起絨織物的生產及外傳的情況〉，《自然科學史研究》，第2期（2000），頁190-198；趙豐，《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頁310-315。

49事實上，早在1576年馬尼拉西班牙總督報導他與華人談話，記錄說，當他詢問中國人哪一些卡斯提爾（亦即西班牙）產品是中國所欠缺的。那些中國人回答說「除掉天鵝絨外，甚麼也不缺」。這幾名中國人還補充說，他們沒有天鵝絨，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製造。一旦他們看到該種產品，他們就學得會。1576年6月7日馬尼拉總督Doctor Francisco de Sande上西班牙國王書，見Blair and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ume IV, 10-75。果然中國人很快就自行織造天鵝絨了。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65：「密邇澳門的新會縣會城鎮的工匠們經過學習，織出可與舶來品媲美的天鵝絨，增加了我國紡織物的品種。」Antonio de Morga (Complete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from their discovery by Magellan in 1520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XVII Century; with descriptions of Japan, China and adjacent countries* (Cleveland, Ohio: The Arthur H. Clark Co., 1907), vol. II, Ch. 8也指出中國帆船載運素面及繡花的天鵝絨前往馬尼拉銷售。Morga的書雖然在1609年出版，但是他所依據的資料並不早過1603他獲任命為

明未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艾儒略（P. Julius Aleni, 1582-1649）在其所著的《西方答問》卷上〈土產〉條提到西洋布云：「布則以利諾草為之，視棉更堅且潔，佳者一匹可十數金。」<sup>50</sup> 案、利諾草即亞麻（*Linum usitatissimum* L.），用以織作的布疋稱為亞麻布（linen）。作者艾儒略以西洋布為亞麻而非棉紗所織，則其所指當係歐洲產品，而非南亞、東南亞所產。比艾儒略早到中國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 1601 年到北京晉見萬曆皇帝，他的禮物清單中有「大西洋各色腰帶四條、大西洋布與葛布共五匹」。<sup>51</sup> 此處稱「大西洋」而非「西洋」，則顯然係指歐洲。所謂「大西洋布與葛布」推測應該是歐洲所生產的絨布與亞麻布。

有一個經常被討論的個案涉及晚明風流人物冒辟疆（1611-1693）。他在所著的《影梅庵憶語》小書中，記載他人在鎮江：

壬午（1642），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紅為裏，為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sup>52</sup>

冒襄（冒辟疆）為董小宛做的輕衫，使用「夏西洋布」為面料。該布乃係外國傳教士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 S. J., 1582-1649；字今梁）寄贈。畢方濟原籍義大利，身為耶穌會傳教士。冒襄特別在所言之「西洋布」前加了一個「夏」字，說不定就是指亞麻布，不排除來自歐洲的可能性。<sup>53</sup>

無論如何，歐洲人來到中國以後，「西洋布」一詞便同時潛在有南亞、東南亞織品或者歐洲布疋兩種可能性。再看下面一個例子：為了與葡萄牙及西班牙競爭（葡萄牙及西班牙在 1580-1640 年間共奉一王），荷蘭與英國在 1619-1623 年間組織

墨西哥總督之前。1601 年造訪廣州的王臨亨，在其《粵劍編》（收在國立中央圖書館輯，「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第 19 冊），頁 142 已經提到「天鵝絨、瑣袂皆產自西洋。會城（廣州）人勅（效？）之。天鵝絨屬者亦足亂真，瑣袂真偽不啻霄壤。」更早，1592 年利瑪竇自廣東韶州寄回歐洲的家書中也提到「幾年前中國人也學會了織天鵝絨，技術不錯。」（明）利瑪竇著，《利瑪竇全集》，劉俊餘、王玉川、羅漁譯（臺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1986），第 3 冊，頁 117。

50（明）艾儒略，《西方答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51（明）利瑪竇著，《利瑪竇全集》，第 3 冊，頁 552。

52（明）冒辟疆，《影梅庵憶語》（臺北：世界書局，1962），頁 7。

53 中國的夏布為苧麻（white ramie, China grass）所織。「清和月」為四月，「晦日」指初一日。壬午年四月初一日為 1642 年 4 月 29 日，是年立夏在 5 月 5 日。冒辟疆為董小宛製夏裝，時機恰當。

了一支「防禦艦隊」(fleet of defense)，伺機攻擊葡萄牙及西班牙兩國的船隻。<sup>54</sup> 1620年時，「防禦艦隊」在追逐澳門葡萄牙船隻時節，一艘英國船遭風沉沒於廣東陽江縣外海。當時任職為廣東省肇慶府推官的鄧士亮奉委派前往打撈，除了小型武器之外，還撈到了「大銃三十六門」，這些武器是他們打撈的主要目的。此外，「紅夷船有西洋布、納絨、胡椒、磁器等貨物」，他們也順便撈起，賣到兩千多兩銀子。<sup>55</sup> 當時鄧士亮還寫信給東安縣徐姓知縣抱怨說：「西洋布一疋，僅價數錢，真可惜也。」<sup>56</sup> 認為其實可以賣到更好的價錢。這艘沉沒的英國船的船貨不多（因為執行作戰任務），除「西洋布」之外，胡椒為東南亞物產，瓷器為中國或鄰近國家所產。因此可以推斷應該是私人的船貨，從而當中的「西洋布」極可能是在南亞或東南亞取得的織品。

進入清代（1644-1911）以後，歐洲國家偶爾也與北京政府有所交涉，彼此贈答的禮物當中，也不時出現「西洋布」這樣的名稱，同時也還會提到其他織品。例如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國家的名義，分別於順治（1644-1661）、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間，數度向中國朝貢。歷次的貢品中，即常出現印度織品。為節省篇幅，僅舉順治十三年（1656）的資料為例：

荷蘭國王恭進御前方物：鑲金鐵甲、鍍金馬鞞、鑲銀劍、烏銃、銃藥袋、鑲銀千里鏡、玻璃鏡、八角大鏡、珊瑚、珊瑚珠、琥珀、琥珀珠、哆囉絨、嘩噠緞、西洋布花被面、大氈、毛纓、丁香、番木寇、五色番花、桂皮、檀香。恭進皇后方物。玻璃鏡、玳瑁匣、玻璃匣、烏木飾人物匣、珊瑚珠、琥珀珠、琥珀、哆囉絨、嘩噠緞、西洋布、白倭緞、花氈、花被面、玻璃盃、花石盒、白石畫、薔薇露。又使臣進貢方物：哆囉絨、倭緞各二疋。嘩噠緞六疋。西洋布二十四疋。琥珀十塊。琥珀珠、珊瑚珠各二串。鏡一面、人物鏡四面。白石畫二面。鑲金刀、鑲銀刀各一把。烏槍、

54 關於「防禦艦隊」，可參考 Paul A. Van Dyke, "The Anglo-Dutch Fleet of Defense (1620-1622): Prelude to the Dutch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Leonard Blussé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2003), 61-81；關於 1620 年的沉船及打撈事件，參考湯開建、吳青，〈萬曆四十八年紅夷船沉陽江始末考——兼談紅夷大炮早期入華問題〉，《澳門基金會》《澳門研究》，第 19 期（2003）；收入湯開建、馬明達編，《中國古代史論集（第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238-272。

55（明）鄧士亮，《心月軒稿》，收在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第六輯，第 26 本，17/1a-4b，〈搗〉。這是鄧士亮轉任南京戶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之後給上級寫的報告內容。

56（明）鄧士亮，《心月軒稿》，13/4ab，〈又（與東安徐令）〉。



長槍各二杆。玻璃盃、雕花木盒、石山匣各二箇。纓帽一頂。皮小狗二箇。花鸚哥一箇。四樣酒十二瓶。薔薇露二十壺。<sup>57</sup>

荷蘭人歷次的貢品當中，屬於歐洲織品的有嗶嘰（long ells）、羽緞（camlets）和大呢（即哆囉呢，broadcloths），因為那些是歐洲產製的主要織品。<sup>58</sup> 此外卻有都還有「西洋布」。

「西洋布」一詞出現在歐洲國家的貢品清單當中，難道不可能是歐洲織品嗎？董建中從《宮中進單》中找到西洋人的進貢資料。其中一件係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1768年7月17日）新到北京宮廷服務的西洋人趙進修（François Bourgeois，亦名晁俊秀）與金濟時（P. J.-Louis Collas）的「土物單」，列舉出18種進貢物品，多數為歐洲製品，但其中的「西洋檳榔膏」應該指甘蜜（gambier，馬來文 gambir），為南亞、東南亞所產。<sup>59</sup> 此外，該「土物單」還列舉了「西洋五彩花大布」與「西洋紅花紫花小布」各貳疋。究竟這四疋西洋花布是歐洲生產的，還是南亞、東南亞製品，無法從資料上逕行判斷。結果是：乾隆皇帝駁回這四疋西洋花布不收。同時也不被收受的同一次進貢的「西洋檳榔膏」確定為東南亞之所產。<sup>60</sup> 西洋花布被拒收，未知是否是因為不是歐洲產品的緣故？

「西洋布」若不是歐洲產品，那是否就可以推斷為印度布織品呢？比較晚的乾隆年間東南亞國家向中國呈進的貢品當中，其實也有「西洋布」。僅舉乾隆二十八

57 (清) 崑岡等奉敕撰，《(光緒)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 503，〈禮部·朝貢·貢物一〉，頁 39-40。案、荷蘭第一次遣使為 1655-1657，由 Goyer 和 de Keijser 率領，隨員 Johan Nieuwhof 記錄此次使行，有包樂史和莊國士譯述的《〈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另兩次荷蘭朝貢的方物清單見《(光緒)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 503，〈禮部·朝貢·貢物一〉，頁 40-41。第二次為一小規模遣使，由 Balthazar Bort 派出 Constantijn Nobel 和 Willem Pedel 擔綱，永積昭，〈鄭氏攻略をめぐるオランダ東インド會社の對清交渉（1662-1664）〉，《東洋學報》，44：2（1961.9），頁 24-53 論述此事，Olfert Dapper 收集了相關史料。《(光緒)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 503，〈禮部·朝貢·貢物一〉，頁 56。此乃第五次遣使，即 Houckgeest 那次，見 J. J. L. Duyvendak, "The Last Dutch Embassy to the Chinese Court (1794-1795),"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34, Livr. 1/2 (1938), 1-137. 除第五次遣使之外，有關其他幾次荷蘭與中國交涉事件的詳細討論，請參考 John E. Wills, Jr., *Pepper, Guns, &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62-16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Embassies &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58 參考 John James, *History of the Worsted Manufacture in England* (London: Longman, 1857; London: Frank Cass, 1968); Eric Kerridge, *Textile Manufactur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59 關於檳榔膏的討論，見龍思泰著，《早期澳門史》，頁 346。檳榔膏即甘蜜，又稱為「兒茶」，可參考韓槐準，〈兒茶考〉，《南洋學報》，第 5 卷第 1 輯（1948），頁 30-41。甘蜜為東南亞特產。

60 董建中，〈傳教士進貢與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清史研究》，第 3 期（2009.8），頁 100。

年（1763）蘇祿國進貢的禮物單為例：

蘇祿國王遣陪臣進貢方物。珍珠、鸚鵡、玳瑁、燕窩、劍、標槍、吹筒、藤席、西洋布、花西洋布、竹絲布、丁香粒、凡十有二種。<sup>61</sup>

蘇祿（Sulu）國偏居菲律賓南部與馬來西亞沙巴州之間，離開東南亞經濟貿易核心頗遠。當地織品完全仰賴進口。由於織品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舉足輕重，還被當成貨幣來使用，一直到 19 世紀初時尚復如此。其日用粗製棉布即來自中國，但其他棉布則來自東南亞其他地方及印度。<sup>62</sup> 1763 年蘇祿挑選來進貢給乾隆皇帝的「西洋布」、「花西洋布」與「竹絲布」很可能皆為印度所產。

西洋布在 16 世紀以後常見，因此小說中也不時提到。例如，在《金瓶梅》第五十五回〈西門慶兩番慶壽旦，苗員外一諾送歌童〉裡寫西門慶給蔡太師送壽禮，其中也有西洋布一項：

翟管家慌跑出門來，叫擡禮物的都進來。二十來扛禮物，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個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余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明珠十顆，又梯己黃金二伯兩，送上蔡太師做贊見的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了抬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歡喜，連聲稱「多謝！」不迭，便教翟管家收進庫房去罷。<sup>63</sup>

又，《紅樓夢》第四十回〈史太君兩宴大觀園，金鴛鴦三宣牙牌令〉裡就講：「鳳姐手裡拿著西洋布手巾，裹著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sup>64</sup>

事實上，印度棉布本來就是 16-18 世紀亞洲境內貿易最大宗的商品，在許多東

61（清）崑岡等奉敕撰，《（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 503，〈禮部·朝貢·貢物一〉，頁 48-57。參考其中暹羅、緬甸、南掌、安南……等國不同年分的貢物清單。

62 見 William Milburn, *Oriental Commerce* (London: Black, Parry & Co., 1813), 424. 參考陳國棟，〈十七世紀初期東亞貿易中的中國棉布——Cangan 與臺灣〉，收在《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 451-478，特別是頁 473。

63（明）笑笑生，《新刻金瓶梅詞話》，民國二十二年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明萬曆四十五年刊本（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1933），第五十五回，頁 6ab。

64（清）曹雪芹著，《紅樓夢》，張俊等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頁 631。

南亞的港市皆可購得。<sup>65</sup>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所經營的亞洲境內貿易（intra-Asiatic trade）當中，印度棉布就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

歐洲人所經營的亞洲內部貿易在 16 世紀初葡萄牙人到達亞洲以後就展開了，隨後在荷蘭人東來以後更長足發展。1619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東印度總督昆恩（Jan Pietersz. Coen, 1587-1629）寫信給阿姆斯特丹的理事會（Court of Directors），描繪出利用亞洲內部貿易來活絡其資金運用的構想如下（數字標號及括弧內文字係筆者所加）：

- ①來自固佳拉特的布疋，我們可以拿來在蘇門答臘的海岸交換胡椒與黃金；②來自海岸（the coast）的銀幣（rials）與棉貨，（我們可以拿來）在萬丹（Banten）交換胡椒；③我們可以（用印度南部的）檀香木、胡椒與銀幣來交換中國商品與中國的黃金；④我們可以藉由中國的商品把白銀從日本弄出來；⑤用來自科羅曼德爾海岸的布疋以交易香辛料、其他商品與來自中國的黃金；⑥以來自蘇拉特（Surat）的布疋交易香辛料、其他商品及銀幣；⑦以來自阿拉伯的銀幣交換香辛料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小東西。  
——環環相扣！所有這一切都不用從荷蘭送錢出來即可辦到，只要有船。<sup>66</sup>

事實上，17 世紀前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其事業經營上，十分倚賴印度織品。荷蘭人取得印度織品的主要地方是科羅曼德爾海岸，印度棉布為交換摩鹿加群島（Maluku, the Moluccas）所產丁香、荳蔻的必要媒介。第八任荷蘭東印度總督 Hendrik Brouwer（1581-1643；1632-1636 在任）因此說「科羅曼德爾海岸是摩鹿加群島的左臂。」（“The Coromandel coast is the left arm of the Moluccas.”）<sup>67</sup>

65 S. P. Sen, “The Role of Indian Textiles in Southeast Asian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2 (September 1962) : 92-110. 參考 John Guy, *Woven Cargoes: Indian Textiles in the Eas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8); 或其改題後的平裝本：John Guy, *Indian Textiles in the East: From Southeast Asia to Japa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9).

66 R. Steengaard,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407.

67 Arasaratnam 指出 Hendrik Brouwer 名言的出處為 H. Terpstra, *De Nederlanders in Voor-Indie* (Amsterdam, 1947), 41-42. 關於印度織品對香料貿易的重要性可參考 Om Prakash, “The Portuguese and the Dutch in Asian Maritime Tr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Trade, Europe and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ed. Sushil Chaudhury and Michel Morinea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5-188.

#### 四、明至清中葉的印度棉布

16 世紀時中國確實進口印度棉布。李約瑟引據一名葡萄牙人（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ca. 1500-1559）的話，說到 16 世紀之前好幾百年來，中國人的船舶就已經帶著金、銀、大黃、各種絲綢錦緞、瓷器、鍍金箱盒與精美家具來到麻六甲。他們帶回去胡椒、印度棉布（Indian cottons）、番紅花、珊瑚、辰砂、水銀、藥物與穀物。李約瑟本人的文字進一步確認 16 世紀後期以前，中國有自麻六甲進口印度棉貨。<sup>68</sup>

合法進口的印度棉布當然有被課稅的義務。王世貞（1526-1590），《鳳洲雜編》就列了一張進口貨物表（圖 4），其中甚多織品。包括：

油紅布、文青布、苾布、花布、大花手中、小花手中、各樣粗布、紅紋節  
知被、花氈、撒（撒？）哈喇、兜螺被、絲手中、暗花打布<sup>69</sup>、沙連布、  
查青禮布、加籠宜布、烏連布、勿那朱布。<sup>70</sup>

當中不盡然是印度產品，也不盡然是棉織品，但確實包含多種印度棉布。《鳳洲雜編》也提供了這些「番貨」的個別單價。（關於這些織品的名稱問題，將在文末略作討論。）晚於王世貞的張燮（1574-1640）在《東西洋考》一書〈稅餉考〉的貨物名目中，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以前的稅則中，只提到畢布（按、即苾布）、鎖服（按、即鎖袱）<sup>71</sup> 與暹羅紅紗三種織品。但在稅則末尾，張燮特別加上，「別有貨物，先年無開載者。今依時估，附記于後」，列舉一些時興商品，當中包括：

68 Joseph Needham (李約瑟),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 4, pt. III, 603. 李約瑟原註：“This Chinese commerce had been notified to the Portuguese King Dom Manuel by Albuquerque in 1512 in an interesting covering letter for a Javanese map which showed all the regular routes and ports of the trading junks.”

69 (元)汪大淵著、蘇繼廬校釋，《島夷誌略校釋》，頁 55-56〈占城〉條講題到占城產「打布」，頁 59 有註如引鞏珍《西洋番國志》〈爪哇〉條「其手中比用者倍闊，名曰打布。男女皆從腰下臀上圍起，至於面臍下，掩閉，卻以狹布巾一條繫於打布上面，名為壓腰。」姚楠認為「打布」當為 tapeh 對音。

70 (明)王世貞(1526-1590)，《叢書集成初編·第 2810 本·鳳洲雜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9-12。

71 鎖服乃係用鳥獸細毛製成織衣料。王士禛(1634-1711)，《香祖筆記》卷 1 云：「滿刺加、哈烈(Herat)出鎖袱，一名梭服，鳥毳為之，紋如紈綺。今閩中最多，價不甚高，非羽紗(camlet)、羽緞(Dutch camlet)比。」參考(清)王士禛，《香祖筆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頁 488。同一頁，王士禛也說：「羽紗、羽緞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僅一、二疋。今閩、廣多有之。蓋緝百鳥毳毛織成。」

哆羅噠：每疋，紅色稅銀五錢一分九釐；餘色每疋三錢四分六釐。番鏡：每面，稅銀一分七釐。番銅鼓：每面，稅銀一分六釐。粗絲布：每疋，稅銀八釐。西洋布：每疋，稅銀一分七釐。東京烏布：每疋，稅銀二分。<sup>72</sup>

「哆羅噠」亦即「哆羅呢」為一種粗製絨布。「噠」或「呢」即點出其為毛織品。至於「哆羅」或「哆囉」則係譯音，有可能是來自法文的“droguet”。曾經在清末出使日本的詩人黃遵憲（1848-1905）在一首描述日本風俗的〈櫻花歌〉，起頭五句為：「鶴金寶鞍金盤陀，螺鈿漆盒攜巨羅，繖張蝴蝶衣哆囉，此呼奧姑彼檀那，一花一樹來娑娑」。該詩的箋注者錢仲聯（1908-2003）說：「哆囉呢為毛織物，即呢之闊幅者。」<sup>73</sup> 依錢仲聯的理解，「哆羅呢」與英文的“broadcloth”應該是類似的東西。<sup>74</sup> 清代大量進口的英國 broadcloth，史料中通常寫作「大呢」。哆羅呢為絨布，並且應該是歐洲的製品。可是張燮所記錄的「西洋布」或許還是應該當作印度棉布來看待。<sup>75</sup>

1624-1662 年間，在荷蘭統治時期，臺灣經常有印度棉布出入；而在鄭氏統治時期，自然也從東南亞進口棉布。<sup>76</sup> 在中國，17 世紀中曾經有一段海禁、遷界時期。海禁、遷界時期所破獲的一個大案件中，也涉及到西洋布或其他南亞、東南亞織品。康熙六年八月二十七日（1667 年 10 月 14 日）兩廣總督盧興祖呈報香山縣知縣姚啟聖違反「遷界」法令，參與走私。盧興祖提報的相關文件包括貨單、賄單以及審答情節的紀錄。該文件提到康熙五年（1666），平民王位中承攬替暹羅辦理進貢的業務。暹羅進貢船有三艘，而他又暗地裏買了一艘民船私下貿易，假裝該船屬於朝貢船隊，藉以突破「遷界」期間禁止朝貢以外其他貿易的禁令。盧興祖提報的文件有云：

72（明）張燮，《東西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 95-99。

73 參考（清）黃遵憲著《人境廬詩草箋註》，錢仲聯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231-232。

74 John Saris (edited by Ernest M. Satow), *The Voyage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 1613*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0), 226, note 3: “*To-lo-ni*, evidently not a Chinese word, is used in the China trade for broadcloth (S. Wells Williams).” 也指出「哆羅呢」就是英國的 broadcloth。

75 哆羅噠的「哆羅」必然使人聯想到久已存在於中國語彙中的「兜羅綿」。「兜羅」兩字為梵文“tūla”的譯音，也寫作妒羅、堵羅、蠱羅……等等。本指草木花絮，常用來指棉花；而「兜羅綿」通常就指棉布。參考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 10-15。

76 荷治時期可從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1903) 看到相關的紀載。明鄭時期因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臺灣設立商管，有相關的史料可參考 Chang Hsiu-jung, Anthony Farrington, Huang Fu-san, Ts'ao Yung-ho and Wu Mi-tsa eds.,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 1670-1685*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5)。

正貢船胡椒壹百伍拾擔，檳榔伍百擔，象牙伍拾擔，檀香陸拾擔。護貢（船）銀貳箱，重貳千肆百兩，海藻貳拾擔，犀角貳包，白燕窩壹擔。象船檳榔叁百擔，西洋布壹捆，絨氈壹捆。

「洋布壹捆，絨氈壹捆。」在同一文件中也記錄為「西洋布陸拾匹，大毯貳張。」這裡所涉及的正貢船之「西洋布」如果不是暹羅本地所產，則應是經由暹羅轉口過來的印度棉布。因為正貢船確實是真正從暹羅過來的船隻，所搭載者為在暹羅備辦的商品。因為係屬貢物，數量並不大。<sup>77</sup>

同一個文件也提到有一張姚啟聖的禮物清單，其內容為「大珠子、珊瑚大枝子、玻璃盤盞，鸚鵡、貓、公狗、珊瑚大佛頭、巧細糖果、蜜梨、葡萄酒、大西洋布。」當中有「大西洋布」一項，即大張西洋布。另外，盧興祖也審查一份姚啟聖先前呈報過巡撫、按察使與廣州府理刑廳推官、關於兩艘違反海禁遷界之令的船隻（可能為葡萄牙人所有）所載船貨的清單。其中一艘船隻的船貨中，除了其他非織品的東西外，有「西洋幔布叁百捆，計陸萬匹。」該船一次進口六萬匹西洋布，規模可謂不小。說明這批西洋幔布應該是作為以中國為市場的目標而運至澳門的。文件上雖然沒有提到這兩艘船從何而來，推測有可能來自印度西岸的臥亞（Goa）。當地十分便於取得 Gujarat 的棉織品。

盧興祖的文件還查核一份澳門議事會代表唛嚟哆（vereador）報告的另外五艘違法進口而被沒收船貨的船舶。這五艘船分別為「馬加撒船」、「甘波蔗船」、「馬勒甲船」、「嚙哇嚙船」與「小馬加撒船」。以上文件多次提到「馬加撒船」，因為當時澳門與位在蘇拉威西（Sulawesi）的馬加撒（Makassar）有頻繁的通商。<sup>78</sup> 五船當中，馬勒甲（麻六甲，Melaka）船載有「西洋幔布貳拾捆」。所謂的「幔」，應該就是以布帛製成，遮蔽門窗等用的簾子，相當於簾幕（curtain）、帷幕（screen）、布篷（tent）等意思。《說文》云：「幔，幕也。……蔽在上曰幔，在旁曰帷。」<sup>79</sup> 「西洋幔布」自然是作為室內裝潢用的西洋布。那些幔布由麻六甲船載來澳門，大有可能

77 盧興祖為漢軍鑲白旗人，康熙四年至五年（1665-1666）年任廣東總督（後期改稱「廣東廣西總督」）。相關事實可參考中山市檔案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盧興祖所呈香山縣知縣姚啟聖貨單、賄單審答過情節冊〉，頁158-170。

78 參考普塔克，〈1640至1667年間澳門與望加錫的貿易〉，收在葉顯思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下冊，頁1206-1219。

79 參考（清）屈大均（1630-1696），《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5，〈貨語〉，頁421-422：「黎幕，亦曰黎幔。」所以幔、幕指同樣的東西。

就是印度棉布。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鄭克塽降清。施琅派人出海探訪海外的鄭家支持者，並且要求鄭氏政權所屬的船舶返航到廈門報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明鄭吏官洪磊與武平侯劉國軒名下的兩艘貿易船從暹羅回到廈門港。經審訊後，獲得如下的資訊：大啤鳥船一隻，管船黃成、蔡允六，為洪磊所有。船上有「公司貨物」、「附搭貨物」與「目梢貨物」三個類別。三個類別即分別歸屬公帳項下，或者為隨船商人以及船員水手所購置的商品，當中都包含相當數量的織品。文件上提到的織品名稱分別為「灰布」、「緝布」、「方氈」、「卯布」、「花圍巾」、「毛裏布」、「陝布」、「粗布」、「布幔天」、「水幔子」、「捲綾」、「毛紬」、「哆囉啤」、「幼布」與「印花布仔」……。品類繁多，分別清楚，顯然是有市場考量的組合（market-oriented assortment）。<sup>80</sup> 該船雖然自臺灣出發，經日本到暹羅貿易，但是施琅下令要它回到廈門港報到。以上的織品當有考慮在福建一帶出售的目的吧。這樣的考量也說明17世紀時，透過東南亞進口到大陸或臺灣的印度棉布必定有相當的數量，並且還擁有一批可以預期的消費者。<sup>81</sup>

臺灣隨即落入清朝統治之下。但一直到18世紀初年，也還是有人觀察到臺灣本地的進口貨中包含了印度棉布在內。耶穌會士馮秉正（Moyriac de Maille）於1714年4-5月間到南臺灣測繪地圖。1715年8月，他從江西省九江府發出一封給人在巴黎舊識Pere de Colonia的信中有如下的描述：

府城名臺灣府，人口很多，是一個大港口，商業也很發達，可和中國大多數人口較多的第一流城市媲美。在那裡應有盡有，有些是本島出產的，如米、糖、鹽、燻鹿肉，這是中國人很重視的；各種水菜；各種布匹、呢、棉、麻、某些樹的皮，和某種很像苧麻的草的皮；更有大量的草藥，大部分是歐洲不知道的。也有從別處運來的，如中國和印度的布、絲、漆、磁，各種歐洲用具等等。<sup>82</sup>

80 《臺灣文獻叢刊·第175種·明清史料》（臺北：臺銀，1963，頁219-222），丁編第三冊，〈部題福督王國安疏殘本〉，頁298-299。

81 廣州方面應該也有類似的狀況，限於篇幅暫不詳述。參考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貨語〉，頁421-422；〈諸番貢物〉，頁429-432。

82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Nouvelle edition (Paris: Chez J. G. Merigot le jeune, Libraire, 1780-1783), tome 18, 432. 中文譯文見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方豪發行；臺灣學生書局總經銷，1969），頁576-598。方豪譯文比較隨意。相關的一句原文作“foit de ce qu'on y apporte d'ailleurs; comme toiles de la Chine & des Indes, foieries, vernis porcelaines, dufférens ouvrages d'Europe, &c.”

臺灣非直接進口印度棉布，當然是經由廣東或福建輾轉進口。

18 世紀以後，印度織品在中國仍有市場。例如，粵海關的稅則當中仍有「二等西洋布」、「西洋粗布」……等名目。<sup>83</sup> 表示仍有進口。從廣州前往九江途中所經的韶關（太平關）與贛關的稅則當中，也同樣列有「洋布、大呢、嗶嘰、羽紗、呢袍套料、呢馬卜料、呢器、洋布被面、洋布手巾」。<sup>84</sup> 其中之大呢、嗶嘰、羽紗即 *broadcloths*、*long ells* 和 *camlets*，確實是歐洲貨。但是洋布、洋布被面與洋布手巾實在無法排除是印度織品的可能性。

東南亞國家，例如蘇祿（Sulu），在 18 世紀時也進貢西洋布。《內務府奏銷檔》，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一個文件提到：

（七月）十三日總管內務府謹奏，為奏聞事。據禮部咨送到蘇祿國遺使進貢方物十一項，內：珍珠二粒、西洋布二疋、花西洋布二疋、竹絲布四疋、籐蓆二領、玳瑁一匣，交廣儲司；劍一對、標鎗一對、吹筒一對，交武備院；燕窩二小匣，交膳房；丁香粒一罐，交藥房。以上物件，臣等照數交各該處查收訖，俟聖駕回鑾後，以備恭呈御覽。謹此奏聞。等因。繕寫摺片，七月初十日交兵部報上帶往，交行在奏事員外郎白齡轉奏。于本月十三日由本報發回。奉旨：「知道了！」欽此。<sup>85</sup>

以上的文獻梳理，證明在 16-18 世紀期間，有多種、多樣、多量的西洋布經由不同的方式，出現在中國，在中國流通。可惜這些西洋布留下的樣本極少，而相關的描述也欠缺具體的準確性。雖然如此，即使是吉光片羽的蛛絲馬跡，也應該是歷史學家的解謎之鑰。以下簡單建議一點可能的研究方向，希望有志者共同努力！

明清之交進口到中國的印度織品，在被以中文名稱記錄下來之後，往往就與之前的行銷網絡上的名稱失去連結，因為已被用另外一種文化加以詮釋，以便適應新

83（清）梁廷柟，《粵海關志》（臺北：文海，1975），9/33b、9/34b。

84 王振忠，《千山夕陽：王振忠論明清社會與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123、頁 145 註 25；王振忠，〈清代徽州與廣東的商路及商業——歙縣茶商抄本《萬里雲程》研究〉，《歷史地理》，第 17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 309。

85 《內務府奏銷檔》第 264 冊，微捲頁 76-78；亦見中央研究院藏影本《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 6 冊。由於外國進貢物品當中有西洋布，因此清宮檔案中偶爾也提及該物。例如乾隆十二年（1747）五月二十日，太監胡世傑交進的物件當中就包括有「西洋布手巾一條」，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 15 冊，頁 39-40。



的市場條件。生產者、訂貨者、行銷者……都可能給以特定的織品特殊的名稱；而命名時考慮的重點可能包括產地、市場、技法、材質、質地、尺寸、花樣、顏色、掌故與用途……等等因素（由於名稱不能太長，因此只能包括當中的一兩項）。再加上，印度棉布並不直接進入中國。它們應該是被帶到東南亞之後，經過輾轉交易，其間也可能被過手者轉換使用的名稱。經過幾度跨文化貿易的交換之後，名稱已經經過多次轉換，無從追索了。這種困難不只發生在中國，就連在印度棉布直接運銷的目的地東南亞也一樣令人困惑<sup>86</sup>，只是中國的情形嚴重到無以復加而已。

如前所言，除了在益王墓出土的那件「西洋布」殘片之外，明清之間流入中國的印度棉布幾乎毫無實物流傳，僅僅在文字文獻中留下若干紀錄。這些紀錄中的名稱大多難以明其究理。不過，如果能將中文文獻當中，可能屬於印度織品的名稱整理成為清單，拿來和以西方文獻及研究為主的同一時期印度棉布名稱清單對照參考，或許有機會對若干中國文獻所見的印度棉布增加理解，乃至於在國外博物館及收藏家的藏品當中找到相同意涵的棉布，這對我們有關印度棉布知識的增加一定大有幫助，研究的層次想來也可以隨之而增高。

16-18 世紀間，提及印度織品的中文文獻，除了琉球的《歷代寶案》之外，至少還有馬歡，《瀛涯勝覽》（1416）；鞏珍，《西洋番國志》（1434）；費信，《星槎勝覽》（1436）；黃省曾（1496-1546），《西洋朝貢典錄》；王世貞（1526-1590），《鳳洲雜編》；何喬遠，《名山藏》；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屈大鈞，《廣東新語》；《明清史料》、《大清會典》；陳倫炯，《海國聞見錄》；謝清高，《海錄》；王大海，《海島逸誌》；梁廷枏，《粵海關志》……以及其他檔案文獻也都記錄了在中國流通過的印度棉布或者中國人在海外所見到的印度棉布。至於歐美語言的研究成果，自然要善加利用。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臺灣、中國曾經在十七、八世紀時有過頻繁的接觸，相關的公司文獻近年來頗多翻譯出版，如《巴達維亞城日記》、《熱蘭遮城日誌》、《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荷蘭人在福爾摩沙》……等等，都有相關資料可堪比對。

舉個例子來說，稍早已經引用過的《明實錄》洪武五年（1372）正月壬子條的紀錄，提及瑣里國王的使臣，在其他物品之外，還進貢了「紅八者藍布四疋、紅番布二疋、覲木里布四疋、白苾布四疋」等棉織品。<sup>87</sup> 這不意外，因為瑣里之地正是

86 參考 Sen, "The Role of Indian Textiles in Southeast Asian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92-110.

87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 71，頁 1313-1314。

棉布產地。

依據 Arasaratnam 的研究，科羅曼德爾海岸所生產的三種最主要棉布就是 longcloth、salempores 與 moris。當中的 longcloth 的標準尺寸為 37 呎長、1 呎寬。Longcloth 當中有一種特定的形式的主要銷往非洲，稱為 Guinea cloth。Salempore 的尺寸變化比較大，大約從 16 呎到 22 呎之間。Coromandel Coast 全境皆有出產，Masulipatnam 一帶的產品十分有名。Mori 則比較厚，而布幅較短，只有 10 呎（約 3 公尺）長，而其寬度亦為 1 呎（約 30 公分）。<sup>88</sup> 只寬 1 呎，看來屬於極為窄幅的織品。別有學者認為其長約 8-9 公尺，寬約 1 公尺 30 公分。<sup>89</sup> 兩者的說法落差頗大，有待進一步研究。Mori 布也拚作 muri 或 mooree。

1684 年歸航的明鄭船隻載有大緝布、中緝布、小緝布、方氈、烏大中卯布、烏中卯布、烏小卯布、花圍巾、毛裏布、烏毛裏布、石青灰布、白粗灰布、烏粗灰布、烏灰布、白陝布、白小粗布、布幔天、水幔子、石青象布、白象布、捲綾、雜色紅毛絨、紅哆囉唻、水灰黃色哆囉唻。<sup>90</sup> 當中的「毛裏布」與「烏毛裏布」顯然就是指 mori 布和黑色的 mori 布。這樣的布疋用途如何呢？

Arasaratnam 對 mori 布有如下的進一步說明。他提到 mori 布：

頗為細緻，品質絕佳。mori 布用來在其上彩繪，而在東南亞地方係以手繪花布的名目發售，稍後一段時間在歐洲也有大量需求。<sup>91</sup>

這樣的織品能在中國找到市場當非難事。明鄭歸航的「大啤」鳥船以之為自暹羅回中國的回頭貨，應當有其合理的商業考量。<sup>92</sup>

88 Sinnappah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on the Coromandel Coast 1650-1740*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98.

89 Giorgio Riello and Tirthankar Roy eds., *How 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 1500-1850s* (Leiden: Brill, 2009), 439.

90 《臺灣文獻叢刊·第 175 種·明清史料》，丁編第三冊，〈部題福督王國安疏殘本〉，頁 298-299。這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明鄭結束後一年的資料。

91 Sinnappah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on the Coromandel Coast 1650-1740*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99.

92 日本茶道使用 Mōru 來稱呼印度、用 Harusia 來稱呼波斯的小塊織品，見諸 18 世紀的一些「裂手鏡 (kire tekagami)」。參考 Kamada Yumiko (鎌田由美子), "The Use of Imported Persian and Indian Textiles in Early Modern Japan", accessed Sep. 20, 2016, <http://digitalcommons.unl.edu/tsaconf/701>.

## 五、結語

講中國棉業史的人士對黃道婆從海南島將軋棉機等生產機具引進長江三角洲的歷史，津津樂道，往往使人誤以為從此中國棉紡織業長足發展，就不再需要從國外進口。事實上，以上的考訂已經說明，明、清時期，外國織品，特別是印度棉布，仍然持續被中國人進口與使用。

雖然我們不能同意 17 世紀初年某位歐洲旅行者的評論，說是：「從好望角到中國的每一個人，不拘是男人還是女人，從頭到腳都穿著」<sup>93</sup> 印度織機的產品，可是明清時期的中國有印度織品進口畢竟是事實。由於中國文獻對進口織品的記載欠缺研究者所需的細節，而傳世實物極少、圖像資料也付之闕如，研究上頗為困難。John Guy 先生的傑出著作 *Woven Cargoes: Indian Textiles in the East* 一書，對於印度棉布在東亞流通使用的歷史作了精彩紮實的論述，但對於中國部分，迫不得已仰賴鄭和下西洋相關的幾部文字紀錄。其第八章標題為「中國」，可是不但沒有織品插圖，篇幅較短（頁 152-157），而且有不少的敘事其實完全用來講越南。最近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出版的 Amelia Peck ed., *Interwoven Globe: the Worldwide Textile Trade, 1500-1800* 一書，<sup>94</sup> 收錄了九篇 16-18 世紀全球織品產銷的優秀論文<sup>95</sup>，但是有關印度棉布在中國使用的概況也一樣有待補強。

顯然，研究此一課題的難關確實不易跨越。本文建議盡可能地爬梳中文史料當中的印度棉布資料，設法與西方人的紀錄與研究成果作比對，若能漸次建立中文文獻所提及之印度棉布在其他語言中的對等用語，一方面可以獲悉有關該項織品的相關資訊，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中國境外的收藏，對其實體建立直接的接觸。果能朝此途徑努力，未來當可具體化對十六、七世紀出現在中國之印度棉布的理解。

93 轉引自 Sen, "The Role of Indian Textiles in Southeast Asian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94.

94 Amelia Peck ed., *Interwoven Globe: the Worldwide Textile Trade, 1500-1800*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95 其第二篇為 John Guy, "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 : Indian Textiles and the Early Globalization of Style", 12-27.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 (宋)法雲，《翻譯名義集》，臺北：新文豐，1987，影印《明嘉興大藏經》本。
- (宋)趙汝适著，《諸蕃志校注》，馮承鈞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點校本。
- (元)王禎，《農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 (元)汪大淵著；蘇繼頤校釋，《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2000。
- (元)趙孟頫，《松雪齋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
- (明)王世貞，《鳳洲雜編》，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第2810本。
- (明)王臨亨，《粵劍編》，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輯，《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第19冊。
- (明)朱隗輯，《明詩平論》，明崇禎十七（甲申）年（1644）刊本。
- (明)艾儒略，《西方答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明)利瑪竇著，《利瑪竇全集》，劉俊餘、王玉川、羅漁譯，臺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1986。
- (明)李東陽等撰，申明行等重修，《大明會典》，臺北：新文豐，1976。
- (明)李景隆等撰，《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冒辟疆，《影梅庵憶語》，臺北：世界書局，1962。
- (明)姚旅，《露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明)徐光啓撰，《農政全書校注》，石聲漢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明)笑笑生，《新刻金瓶梅詞話》，民國二十二年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明萬曆四十五年刊本，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1933。
- (明)馬歡著，《瀛涯勝覽校注》，馮承鈞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明)張燮，《東西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 (明)黃衷，《海語》，道光廿五年冬十一月南海伍氏開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翻印本。
- (明)諸家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87種·使琉球錄三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
- (明)鄧士亮，《心月軒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第六輯，第26本。

- (明) 譚元春,《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清) 王士禛,《香祖筆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 (清) 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 英和等編,《欽定石渠寶笈三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 (清) 崑岡等奉敕撰,《(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
- (清) 曹雪芹著,《紅樓夢》,張俊等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 (清) 梁廷枏,《粵海關志》,臺北:文海,1975。
- (清) 黃遵憲著,《人境廬詩草箋註》,錢仲聯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中山市檔案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各冊。
- 〈元趙孟頫致晉之尺牘〉,收入《元趙孟頫七札》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藏影本。

### 近代論著

- 中國古代科技文物展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代科技文物展》,北京:朝華出版社,1997。
-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方豪發行;臺灣學生書局總經銷,1969。
- 王元林、林杏容,〈十四至十八世紀歐亞的西洋布貿易〉,《東南亞研究》,2005年第4期,頁86-91。
- 王振忠,〈清代徽州與廣東的商路及商業——歙縣茶商抄本《萬里雲程》研究〉,《歷史地理》,第17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頁297-315。
- 王振忠,《千山夕陽:王振忠論明清社會與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王華、張伍聯,〈尼雅遺址出土的東漢蠟染布研究〉,《東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卷第1期,2006年3月,頁24-27。
- 多默·皮列士著,《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何高濟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鈕夫婦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頁16-28。
- 伯希和(Paul Pelliot)撰,《交廣印度兩道考》,馮承鈞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
- 約翰·尼霍夫著,《〈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荷)包樂史、(中)莊國土譯,廈門:廈門

- 大學出版社，1989。
- 夏鼐，〈我國近五年來的考古新收獲〉，《考古》，1964年第10期，頁485-493、507。
-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輯，《故宮書畫錄（上）》，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6。
- 許智范，〈地宮幽壙·秘藏奇珍——明朝益藩王府寶器欣賞（下）〉，《收藏界》，2003年第11期，頁11-14。
- 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2。
- 陳國棟，〈十七世紀初期東亞貿易中的中國棉布——Cangan 與臺灣〉，收入《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451-478。
- 陳國棟，〈談熙寧十年注輦與三佛齊入貢中國事——關於地華伽囉（Deva Kulottunga）〉，收入《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45-63。
- 陳澄泉、宋浩傑主編，《被更烏涇名天下：黃道婆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勞費爾著，《中國伊朗篇：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的貢獻》，林筠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 勞費爾著，《中國與伊朗：古代伊朗與中國之文化交流》，杜正勝譯，臺北：國立編譯館，1975。
- 普塔克，〈1640至1667年間澳門與望加錫的貿易〉，收在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下冊，頁1206-1219。
- 湯開建、吳青，〈萬曆四十八年紅夷船沉陽江始末考——兼談紅夷大炮早期入華問題〉，《澳門基金會》《澳門研究》，第19期，2003年12月；收入湯開建、馬明達編，《中國古代史論集（第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238-272。
-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董建中，〈傳教士進貢與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清史研究》，2009年8月，第3期，頁95-106。
- 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
- 趙翰生，〈明代起絨織物的生產及外傳的情況〉，《自然科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頁190-198。
- 趙豐，〈尼雅出土蠟染棉布研究〉，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九、十輯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頁790-802。
- 趙豐，《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2。
- 劉序楓，〈財稅與貿易：日本「鎖國」期間中日商品交易之展開〉，收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275-318。

- 龍思泰著，《早期澳門史》，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注，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 薛堯，〈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頁318-320。
- 韓槐準，〈兒茶考〉，《南洋學報》，第5卷第1輯，1948年，頁30-41。
- 小葉田淳，《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日本評論社，1939。
- 永積昭，〈鄭氏攻略をめぐるオランダ東インド會社の對清交渉（1662-1664）〉，《東洋學報》，44：2，1961年9月，頁24-53。
- 吉岡幸雄，《京都書院美術雙書・20・更紗》，京都：京都書院，1993。
- 杉本直治郎，〈元代南海における貿易品としての西洋布——その用いられたる地方とその産地——〉，收入同氏，《東南アジア史研究》，東京：巖南堂書店，1968，1956，頁609-636。
- 沖繩県立図書館編，《歷代寶案》，那覇：沖繩県教育委員会，1992。
- Arasaratnam, Sinnappah.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on the Coromandel Coast 1650-1740*.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Aslanian, Sebouh David.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Mediterranea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s of Armenian Merchants from New Julf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Balfour-Paul, Jenny. *Indigo*.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8.
- Blair and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ume IV.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1903-1909.
- Blair, E. H. and Robertson, J. A.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from their discovery by Magellan in 1520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XVII Century; with descriptions of Japan, China and adjacent countries*. Cleveland, Ohio: The Arthur H. Clark Co., 1907.
- Campbell, William.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1903.
- Chang, Hsiu-jung, Anthony Farrington, Huang Fu-san, Ts'ao Yung-ho and Wu Mi-tsa eds.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 1670-1685*.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5.
- Chaudhuri, K. N. *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Corteseo, Armando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 account of the East, from the Red Sea to Japan, written in Malacca and India in 1512-1515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Rutter of a Voyage in the Red Sea, Nautical Rules, Almanack and Maps, written and drawn in the East before 1515*. New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90.
- Dale, Stephen F. "Silk Road, Cotton Road or ... Indo-Chinese Trade in Pre-European Times." *Modern Asian Studies*, 43:1 ("Expanding Frontiers in South Asian and World History:

-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F. Richards) (Jan., 2009): 79-88.
- Das Gupta, Ashin *Indian Merchants and the Decline of Surat, c. 1700-1750*. Wiesbaden, Germany: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9.
- Duyvendak, J. J. L. "The Last Dutch Embassy to the Chinese Court (1794-1795)."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34, Livr. 1/2 (1938): 1-137.
- Edwards, Eiluned. *Textiles and Dress of Gujarat*.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2011.
- Gittinger, Mattiebelle. *Splendid Symbols: Textiles and Tradition in Indonesia*. Singapor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Guy, John. *Indian Textiles in the East: From Southeast Asia to Japa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9.
- Guy, John. *Woven Cargoes: Indian Textiles in the Eas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8.
- Hamashita, Takeshi (濱下武志). "Ryukyu Merchants and Their Pepper Trade under Tributary System: 15th-17th Centuries." 收在陳國棟主編,《漢文化與周邊民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115-172。
- James, John. *History of the Worsted Manufacture in England*. London: Longman, 1857; London: Frank Cass, 1968.
- Kamada, Yumiko (鎌田由美子). "The Use of Imported Persian and Indian Textiles in Early Modern Japan." Accessed October 04, 2016. <http://digitalcommons.unl.edu/tsaconf/701>.
- Kerridge, Eric. *Textile Manufactur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 Leslie, Donald Daniel.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Kaifeng*. Leiden: Brill, 1972.
-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Nouvelle édition. Paris: Chez J. G. Merigot le jeune, Libraire, 1780-1783, tome. 18.
- Maxwell, Robyn J. *Sari to Sarong: Five Hundred Years of Indian and Indonesian Textile Exchange*. Canberra: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2003.
- Milburn, William. *Oriental Commerce*. London: Black, Parry & Co., 1813.
- Nabholz-Kartaschoff, Marie-Louise. "The Textiles of Sembiran." Accessed October 04, 2016. [http://webdoc.sub.gwdg.de/univrlag/2008/GBE1\\_bali/04\\_nabholz\\_textiles.pdf](http://webdoc.sub.gwdg.de/univrlag/2008/GBE1_bali/04_nabholz_textiles.pdf)
- Needham, Joseph (李約瑟).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Peck, Amelia, ed. *Interwoven Globe: The Worldwide Textile Trade, 1500-1800*.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Pires, Tomé.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 Translated by A. Contesao.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4).

- Pollak, Michael. *The Jews of Dynastic Chin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Cincinnati: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Sino-Judaic Institute, Menlo Park, Calif., 1993.
- Prakash, Om “The Portuguese and the Dutch in Asian Maritime Tr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Trade, Europe and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edited by Sushil Chaudhury and Michel Morineau, 175-18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Riello, Giorgio and Roy, Tirthankar eds. *How 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 1500-1850s*, Leiden: Brill, 2009.
- Sakamaki, Shunzō. “Ryukyu and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3 (May, 1964): 383-389.
- Saris, John. *The Voyage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 1613, edited by Ernest M. Satow*.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0.
- Sen, S. P. “The Role of Indian Textiles in Southeast Asian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2 (September 1962): 92-110.
- Steengaard, R.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 Tan, Yeok Seong. “Chinese Element in the Islam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 Study of the Story of Njai Gede Pinatih, the Great Lady of Gresik.” In *Collected Writings from the Ya-Yin Studio*, 109-117. Singapore: The South Seas Society, 1983.
- Tobar, Le P. Jérôme. *Inscriptions Juives de K'ai-Fong-Fou*.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12.
- Van Dyke, Paul A. “The Anglo-Dutch Fleet of Defense (1620-1622): Prelude to the Dutch Occupation of Taiwan.”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dited by Leonard Blussé, 61-81.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2003.
- Wills, John E. Jr. *Embassies &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Wills, John E. Jr. *Pepper, Guns, &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62-16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Yule, Henry and Burnell, A. C.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 Indian Cotton Goods in 16<sup>th</sup>–17<sup>th</sup>–Century China

Ch'en, Kuo-tu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most of those Indian textiles reached Chinese hands either came from Southeast Asia (both mainland and islands) as tributes, or through the hands of Ryukyuan and Chinese merchants. The movement of Indian goods to the Chinese was roundabout, and in consequence, it is always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names and origins of a certain cloth recorded in Chinese source materials. Making it even worse, there are very few known relics of such kind of stuffs. Not much research has thus yet done on this subject.

However, written documents are rather easily available. Probably we can sort out from historical sources first, trying to identify as many items as we can, and suggesting some ways for further research. By so doing, we can also get to know the Chinese impression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time under discussion, and learn about some aspects of Euro-Asian interactions.

The paper utilizes diverse materials to document the story. It tries to find out how was the Indian cotton goods circulated in China and what was their impact upon Chinese daily life and cultural pursuit. It tries also to suggest a way of identifying names of Indian cottons both in the Chinese and European records. By so doing, it will be possible in the future to make use of Western collections to broaden our knowledge about those Indian textiles ever in the Chinese holdings previously only known by names.

**Keywords:** Indian cloths; broadcloths; Coromandel; Nagapattinam; Ryuk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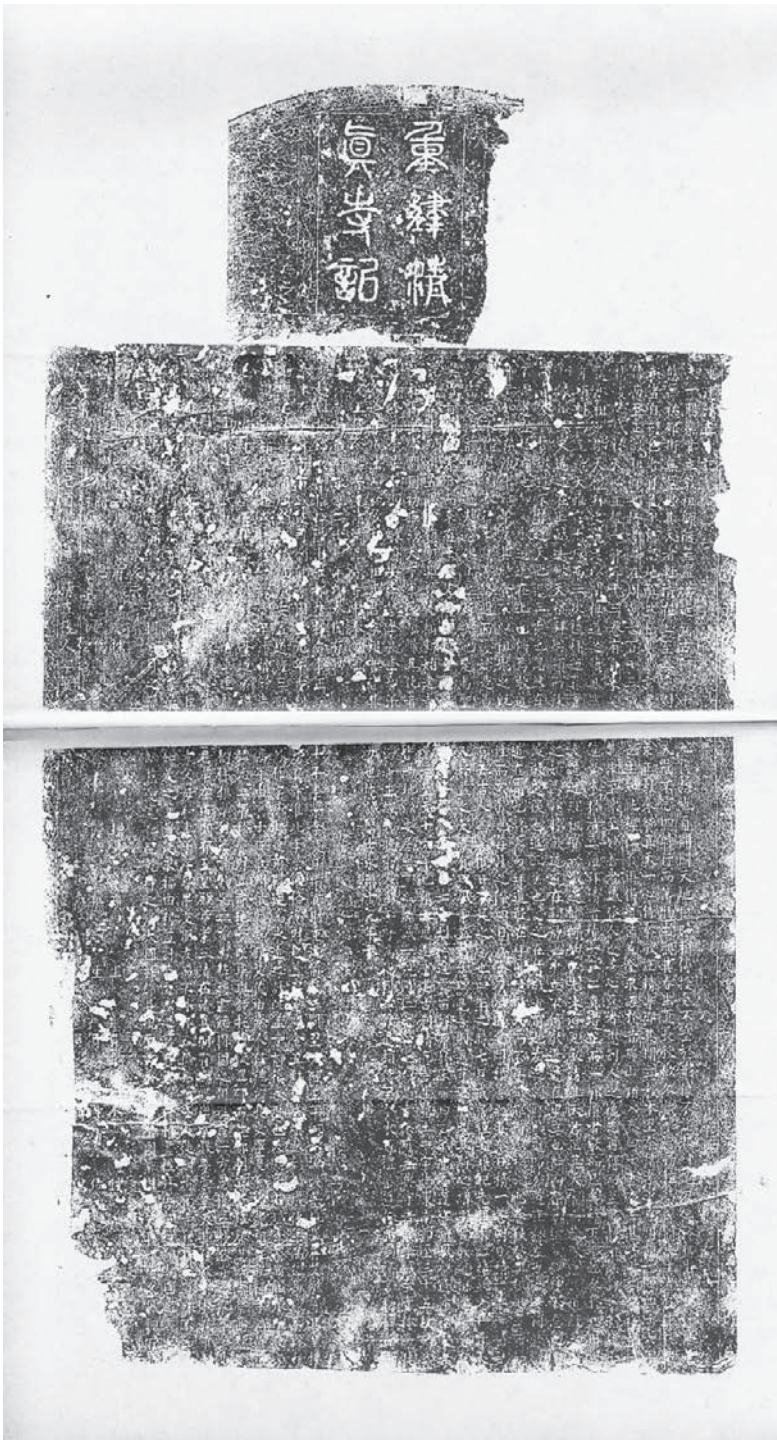


圖1 〈重建清真寺記〉碑拓本



圖2 〈重建清真寺記〉碑拓本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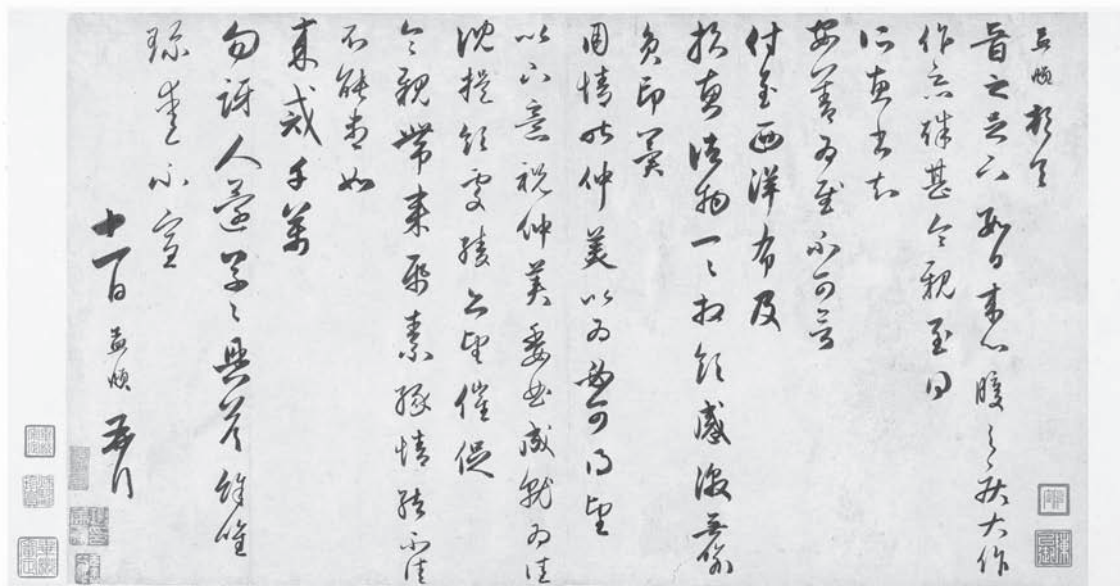


圖3 元 趙孟頫〈致晉之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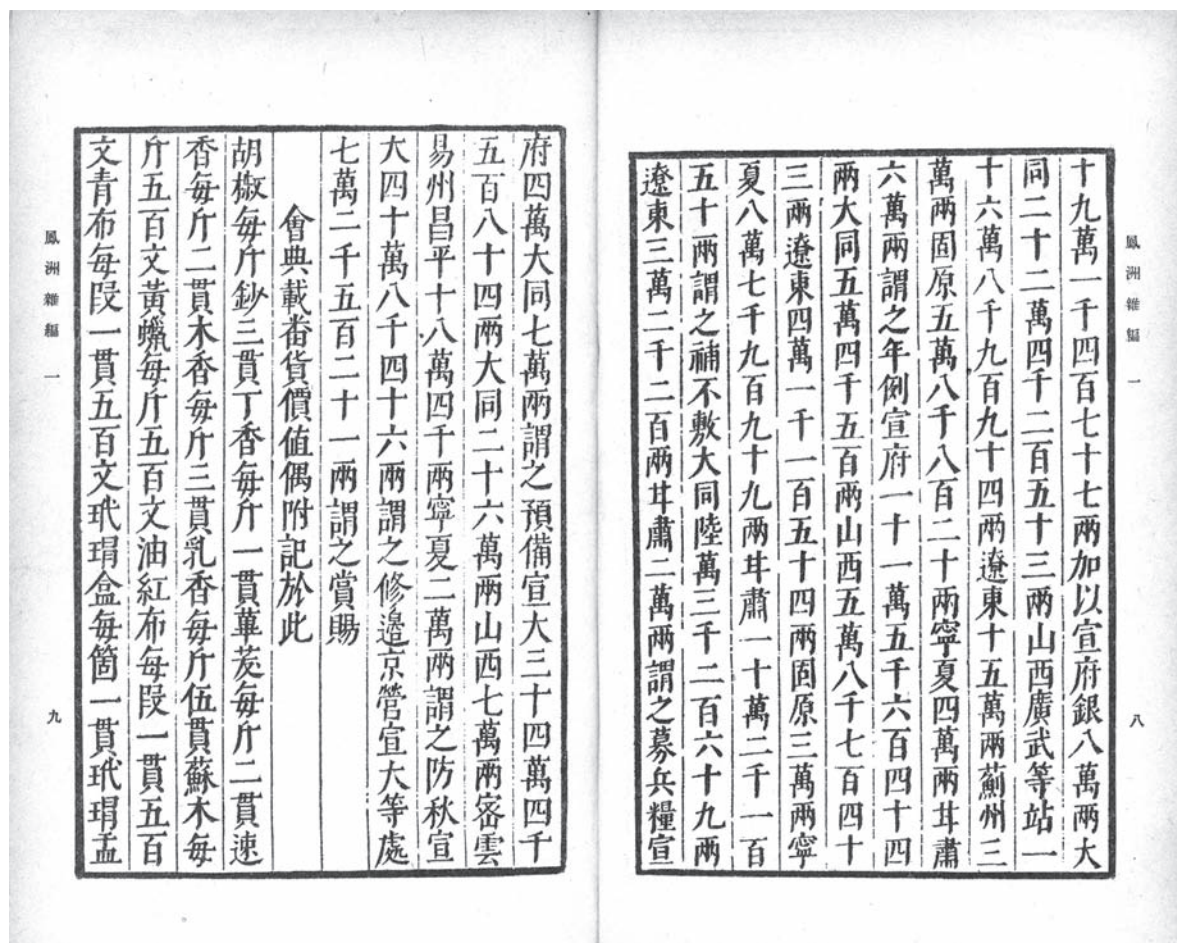


圖 4-1 明 王世貞《鳳洲雜編》書影

鳳洲雜編 一

每箇一貫藤竭表裏每斤一貫沒藥每斤五貫金銀  
 香每斤五百文大楓子每斤一百文錫每斤五百文  
 苾布每疋一十五貫肉苳蔻每斤五百文古刺水內  
 大合一貫小合五百文豈蔻花每斤五百文腰刀每  
 把三貫鐵每斤三百文花布每段一貫大花手巾每  
 條二貫小花手巾每條一貫一應各樣粗布每段一  
 貫沉香每斤三貫黃熟香每斤一貫單澄茄每斤一  
 貫翠毛每斤三百文烏參泥每斤五百文紅紋節知  
 被每條五貫鹽每斤一百文梔子花每斤一貫丁皮  
 每斤五百文悶蟲藥每斤二百文象牙每斤五百文

一〇

花氈單每條一十貫撒哈喇每疋一百貫珊瑚枝每  
 斤三十貫血竭每斤一十五貫龍涎香每兩三貫蘇  
 合油每斤三貫大玻璃鏡每箇三貫小玻璃鏡每箇  
 二貫大小玻璃碗各同玻璃燈甌一箇二貫鶴頂每  
 箇二貫赤金每兩伍十貫足色銀每兩十五貫降真  
 香每斤五百文妥剔牙每斤一貫膽礬每斤二貫回  
 回石青每斤一貫珊瑚珠每兩二貫烏木每斤五百  
 文安息香每斤五百文紫檀每斤五百文木鱉子每  
 斤三百文雄黃每斤五百文阿魏每斤二貫兜羅被  
 每段十五貫絲手巾每條二貫粟米珠每兩伍貫油

鳳洲雜編 一

二

圖 4-2 明 王世貞《鳳洲雜編》書影

血石每兩二貫番砂每斤二百文夕牙吸答納每斤  
 五百文八的阿納每斤四百文三額阿刺必每斤五  
 百文別模刺每斤五百文厥枯露每斤三百文加定  
 每斤五百文哈都味思每斤五百文阿思達模塗兒  
 氣每斤五百文暗花打布每段一貫沙連布每段一  
 貫查青禮布每段一貫加籠宜布每段一貫烏連布  
 每段一貫勿那朱布每段一貫蘇麻達每斤二百文  
 番弓每張二貫番箭每枝一百文

南京守備協同叅贊坐次

正統中襄城伯李隆正中坐戶部黃少保福左側坐

公退左右對坐少保卒兵部徐侍郎左側坐襄城去  
 豐城侯李賢代徐侍郎陞尚書仍左側坐都督趙倫  
 協同地平下左側坐後輩靖遠伯王驥代徐尚書為  
 總督與豐城分左右正坐靖遠左寧遠伯任禮代豐  
 城仍在右靖遠伯還朝徐尚書復來杜侍郎寧始推  
 尚書與寧遠分左右正坐張右都純監督操軍不預  
 守備事下教場與徐尚書分左右正坐張都御史在  
 左趙都督仍舊坐戶部張尚書鳳來右邊稍偏正坐  
 戶部沒張都御史陞兵部尚書叅贊右邊正坐寧遠  
 告老平江伯陳豫代與張尚書仍分左右坐平江去

圖 4-3 明 王世貞《鳳洲雜編》書影

